

書介

文：草 草

新界鄉議局史

定價：港幣148元

作者：薛鳳旋、鄭智文
出版：三聯書店 (香港)



1899年英國接收新界，香港殖民地政府在1905年以「集體官批」改變了新界土地擁有權的形態，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在新九龍與新界部分地區收地及徵收建屋補償。自此之後，新界居民便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與政府就土地問題展開長達幾十年的交涉。鄉議局自1926年成立以來，就一直就新界的政治、土地、民生等問題與政府交涉，為統合新界民意而努力。這書旨在把鄉議局80多年的發展放在香港、新界與中英關係的歷史脈絡之中，研究鄉議局的角色，剖析它與殖民政府和居民關係的共通點、它在新界這個自19世紀末開始的租借地僅餘案列及其所處的特殊環境下的特點，及它在1997年後「一國兩制」中的位置。

勇往直前：我如何拯救星巴克

定價：新台幣390元

作者：霍華·舒茲、瓊安·戈登
譯者：譚家瑜、葉有聲
出版：聯經出版



這書除了言簡意賅地敘述美國企業遭受經濟風暴波及的窘境，也鉅細靡遺地透露星巴克如何在擾攘不安的環境中奮鬥求生、重建自我。讀者可從緊湊的敘事節奏中，感受到星巴克每日面對的激烈競爭壓力，同時體會到舒茲克服個人限制、改變領導作風所經歷的內心轉折。本書透過引人入勝、坦率直言的筆調，記錄一個品牌和一名商人邁向成熟的故事。

桃花井

定價：新台幣260元

作者：蔣曉雲
出版：印刻



鄉親後叫「台灣老頭」的李謹洲老先生，歷經大半生離亂顛沛，幸好等到了兩岸開放探親後，在家鄉尋回失散的長子，更進一步找了個桃花井的寡婦董婆董婆，打算在內地老家重新組建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兩岸的隔閡、城鄉的差距、父子的代溝、個性的衝突、私利的擠壓等問題交相衝擊上演；且看老人如何智慧布局，在命運荒謬卻又見真情的人生過程中，遂其所願落葉歸根。以往這類題材書寫，往往來往血淚交織的苦難記憶。然而蔣曉雲的小說有張愛玲式的冷靜旁觀，談諧幽默，把人生的體會和感動熱鬧開編進故事中。她不跟文字搏鬥而與之和諧相處，沒有苦悶頹廢虛無等，字裡行間，一種練達、一種世故，在當代小說書寫中呈現少有的清明風格。

我該如何閱讀

定價：新台幣300元

作者：亞倫·傑柯布
譯者：林修旭
出版：大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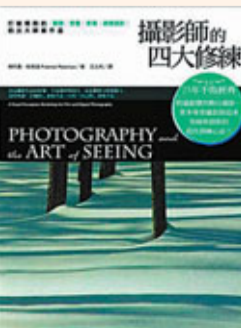


現在的讀者越來越害怕巨著，深怕自己讀不懂或者是讀不對，也有很多學者大聲疾呼，現在的人讀得不夠，甚至讀的不是該讀的。作者認為這些憂慮大可不必，閱讀始終不應該是苦差事，而是賞心樂事，尤其是在這個數位時代，閱讀已經全面滲透到生活每一個部分。傑柯布傳授的閱讀方法能溫暖嚴肅閱讀者的心，同時引領許多可能加入的閱讀者能夠享受欣賞好文字的滿足感。

攝影師的四大修練

定價：新台幣420元

作者：佛利曼·帕德遜
譯者：比利
出版：漫遊者



決定攝影作品的好壞，不是器材與技巧，而是觀察力與想像力。沒有所謂「正確的」表現手法，只有「自己的」表現手法——快門先決、光圈先決，不如意念先決。攝影成就與安瑟·亞當斯等大師同獲肯定的佛利曼·帕德遜，用這書幫助攝影師與攝影愛好者打破觀看和攝影的舊思維，針對攝影者的觀察力、想像力、表現力，提供攝影技巧的建議和相關練習，讓攝影者學習建立對拍攝主體的深刻認識，找到自我風格的方向。

駱以軍

小說家如何進入城市的夢境？

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剛出道時曾被評論家唐諾比作「股價高飆時的華碩」，是「最應長期持有的潛力股」。從事寫作多年，他的作品獲得多項重要華文文學獎，亦多次獲選《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被稱為台灣60年代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在記者的印象中，駱以軍是率性又謙和的胖老師。第一次見到他是去年，他剛憑《西夏旅館》拿到香港浸會大學頒發的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在浸大的賓館中，他穿着大T恤做訪問，期間不時犯煙癮，把頭伸到窗外抽煙解饞，說到興奮處手舞足蹈，連喊出幾個「他媽的」。

今年3至5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駱以軍擔任2011年之駐校作家。日前，他出席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仍是率性不改，談現代小說家們所遭遇的創作情境之餘，也爆出自已在香港的趣事醜事，引得在座嘉賓歡笑連場。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台灣作家駱以軍出席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尉瑋攝

說個笑話

駱以軍當晚的講話，仍然聚焦於他這一代創作者所共同面對的處境，由於經驗匱乏所造成的「先天的限制」。他先說起幾年前作家阿城去台北，私下裡講過一個笑話。話說阿城年輕時，遇到同樣長期住在紐約的著名作家木心。阿城問木心，有沒有辦法用三個笑話把紐約的感覺講出來。木心真的講了。其中的一個，是講一個老太太坐地鐵，在站台上不小心把票掉下了鐵道。列車就快要進站，旁邊的人都為她捏一把汗。卻只見這個老太太不慌不忙地從包裡掏出口香糖嚼了起來，再從身上的破毛衫中抽出一條毛線黏着口香糖，然後像釣魚一樣把票給釣了上來。那一刻，站台上的各色人等，就連那些頭髮染得五顏六色的朋克少年，都為她鼓掌。阿城聽完說，沒錯，這就是紐約。

駱以軍聽到這故事時禁不住想，自己是否也有辦法在短暫的閒談中，隨便地講出這麼幾個小故事或者笑話？非關幽默，而是這笑話後面的教養和經驗。「我曾經有本書叫《經驗匱乏者筆記》，講的就是我這個年代——1960年代的創作者。像塞萬提斯寫《堂吉珂德》，或是莫言寫《紅高粱》，那是小說最美好的時光。我們出生的年代，如昆德拉所說，小說家可以在曠野上沒有時間的限制，自由揮灑故事的神秘時刻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城市的地平線已經被各式各樣的高樓大廈所切斷。」

城市中的小說家

這些高樓大廈是一種隱喻，不光指那些直插入天際的摩天大樓，而是每個大廈所包含的現代話語體系：醫院、警察局、大學、旅館、百貨商場……它們代表着後期資本主義所有描述世界的方式。駱以軍說，在這個由分類細緻的專家話語所運轉的世界中，小說家很難如同19世紀時，可以用一個全景的位置去看待人類存在的狀況。「我二十幾歲啟蒙時，看到的世界已經是卡夫卡所看到的世界。就像王安憶所說：城市無傳奇。我們很難再去講一個像張愛玲的《半生緣》那樣的故事，也不大可能再像老舍那樣講老北京，像西那那樣寫香港。」

一個小說家如何進入城市的夢境，如何有能力去調動這個城市的抒情時刻，甚至，如何去講能令人會心微笑的笑話？也許還是那句話：經驗和教養。而駱以軍說，他這一代的創作人正處在「經驗的匱乏」中。他談到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裡面的主角是布拉格底層的打包工，把這個城市所有不黑的書籍回收成廢紙站。「這些書中可能有孔孟，有黑格爾，有仿冒的畫、山寨版的海報、戲院的票、各式各樣的色情

書刊、屠宰場沾滿血污的包裝油紙……這是這城市集體所有生活所有命運交織的細節，而這個人，我覺得就是一個城市中的小說家的身份，他的工作是把這所有的文明集體打包成一個個廢紙塊，是一個很虛無但是很龐大的文明的現代主義式的形象。」

城市無傳奇

說到城市與創作的關係，駱以軍不好意思地說起第一次到香港的爆笑經歷。1997年，他和太太新婚，蜜月旅行時來了香港，臨時決定坐觀光電梯到中銀大廈的頂樓去看維港景色。為了躲過排隊的長龍，他自作聰明地帶着太太混上了中銀的員工電梯，以為同樣可以通向70樓的觀景台，卻不想是闖入了辦公禁區。愕然發現沒有電梯可以下樓後，被困在走火通道中的兩人只能狼狽地徒步跑下60幾層樓，駱以軍更因為過度緊張而想拉肚子，差點在樓梯間「幹壞事」。好不容易衝回一樓，卻被保安人員如同圍堵恐怖份子般重重包圍，不懂廣東話的他連問廁所在那都無人理會，渺小又無助。澄清誤會後才知道，兩人早就無意中觸動了整棟大樓的保安警鈴而不自知。

「這給我很震撼的印象，讓我想起莫言的《紅高粱》中，人的形象是無比高大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中，人物甚至可以把天地的畫面都動搖。昆德拉說，可是到了20世紀的小說家，所有的主人翁都只能是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翁，那個土地測量員K，你就像被如來佛困住的孫悟空。經驗着這些的我們，要怎麼去說故事呢？」

駱以軍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那是當時台灣的一則社會新聞。年老的母親許下心願，希望過世後兒子將自己的器官捐給指定的醫院。這間醫院與自己家幾乎是在整個城市的南北兩極。母親過世後，兒子四處打聽，碰巧一時沒能找到運送屍體的方法，他就把母親的遺體放在輪椅上，搭地鐵從最南去最北。這個消息被報後，在社會上引起嘩然，甚至有議員倡導立法，禁止用公共交通工具運送人類遺體。「但我當時有種很強烈的感受，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古典時代，會是個很美的故事。這裡面有很多美德：母親捐髓，遺愛人間，兒子嚴守信諾。那畫面的感覺像是一個孤獨的兒子背着媽媽，從最南到最北，穿過整個城市，是一個古典時刻。可是如同昆德拉說，現代性小說中，古典的最抒情的一刻是一去不回了。後來的小說家因為缺乏經驗和教養，已經沒有能力再這樣講故事了，沒有辦法掌握抒情詩的能力、笑話的能力、會心的能力，經驗、歷史、龐雜記憶的能力。他的故事只能是空的，是一個男人推着母親

「深圳啟蒙時代」——讀陳秉安《大逃港》

書評

文：黃樹森

「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蠅。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寶安縣（現深圳市），老百姓中廣為傳唱。這首山歌直指當時廣東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逃港。到1979年，這個問題演變成了惡性的政治事件。

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說到逃港問題的時候，他說：「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最後，他總結說：「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問題……不是軍隊管得了的。」

大饑荒推動大逃港；大逃港引發大開放。由此，有人說，正是廣東的逃港問題，直接促成了上層的改革開放決策。陳秉安的《大逃港》，其命意結穴處，即在還原「大逃港」的歷史現場，尋找開放改革的直接動因；探索深圳「啟蒙時代」的深藏密碼。記得哪一年，我跟陳秉安聊天時，坦言：釐不清大逃港的歷史真相和理性思考，深圳開放改革歷史就是一筆糊塗賬，到底逃走了多少人？有多少種逃亡形式？引發多少歷史時代思考？

真話是決策的底線和真理的基礎，任何一種文化概莫能外。無真話即無真理；無真相的決策，宛如沙灘上的高樓大廈，無論怎樣的壯觀雄偉，小小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倒塌。如果真話的丁香花凋謝，彌天大謊的罌粟花必然盛開。

中國的開放改革能夠成事，就是從精英到草根，看到了真相，講了真話。《大逃港》揭示了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歷史細節：1961年寶安檔案中，有一個幹部就發出了「打開國門，對港開放」的呼號；1962年的《偷渡者日記》坦露出他內心的煎熬。

這和鄧小平聽聞「養五隻鴨子是資本主義」的驚訝；萬里看到幼兒在鍋中取暖的痛哭；彭德懷看到工人無褲可穿的怒斥；吳南生發出「汕頭猶如國民黨統治」的感慨一樣，說了真話，展露真相，道出了當年中國環境的危如累卵。在那個時代，說這樣的話，或雲開日昇，或前途未卜，或慷慨成仁，需要膽識和大義，需要承擔高風險的代價和付出。

報告文學寫作紛呈異彩。《大逃港》側重文學形式的「社會檔案式」敘事，貫通文學性社會性思考性，尚崇報告、客觀和真實。陳秉安集二十年之動，在「真實」上做足文章，於冷靜中保持質疑，「旁行斜出」，成果斐然。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發生、興起、強盛，並非由某個聖賢豪傑「奇思異想」結果，而是在諸多社會力量各自利益追求的碰撞中，順應某個國家民族或正面或反面的「歷史願望」和「歷史訴求」，並作歷史選擇。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深圳河邊「大逃港」，此起彼伏，綿延不斷，逃亡者涉及十幾省市，逃亡人數達百萬之眾。《大逃港》從「大放河口」；從「反瞞產」到「大饑荒」；從東莞寶安民兵排長逃港；從省委書記與大隊支書的辯論，以幾十年歷史之經，以國家明智領導，地方官員，平民百姓為緯，大筆敘寫人們的懷疑、困惑、憤懣、抗爭精神，深情探求為改變貧窮，嚮往自由幸福的「歷史願望」。

深圳「大逃港」催化了深圳的「大開放」，不是歌詞所唱的，「一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而是老人們從反面順應「大饑荒」、「大逃港」的「歷史願望」、「歷史訴求」中，作了正確的歷史決斷和歷史選



作者：陳秉安
出版社：中和 (香港)
出版時間：2011年1月
定價：港幣98元

深圳大逃港，無疑是它的催化劑了。《大逃港》多視角別出機杼地為我們探索「深圳啟蒙時代」：無奈而弔詭，錯愕而驚訝，悲喜而交加，啟蒙，成了艱難世時的定海神針。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在反思德國歷史的《剝洋蔥》中說：「回憶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偽裝」。然，陳秉安的《大逃港》是可信的，在我感覺來說。

（本文作者為廣東省政府參事、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文藝理論家。）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